

试论两湖地区文化的基本特性

江凌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 自春秋战国以来, 两湖地区经过相对漫长而持续的文化交流、融合过程, 逐渐形成荆楚文化区。与其他地区相比, 两湖地区具有明显相似的文化属性和心理归宿。尽管这种文化区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域界限, 但事实上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感觉文化区域, 而且根深蒂固, 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以古楚语为共同源头的语言, 尚武的习俗, 以“相”、渔歌著称的流行民歌, 以信奉佛教为主的宗教信仰, 是该文化感觉区域的文化基本特性。

关键词: 两湖地区; 荆楚文化区; 文化特性

中图分类号: G 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9)03-0414-05

一、荆楚文化感觉区的形成

区域是地理学的基本分析范畴。区域是一个具有具体位置的地区, 在某种方式上与其他地区有差别, 并限于这个差别所延伸的范围之内。从本质上讲, 区域是地理空间的一种分化, 分化出来的区域一般具有结构上的一致性 or 整体性。这里的结构包括自然环境结构、空间结构、城乡结构、行政结构、文化结构等。区域可以按自然环境、行政区划来划分, 也可以按文化区域来划分。比如, 历史上的齐鲁文化区、三秦文化区、中原文化区等。文化的发展既有时代的变迁, 又有区域的差异^{[1](2)}。根据现代地理学对区域的解释, 文化地理区是指具有相似的文化现象和特征, 或具有某种文化特征的人的群体在空间上的分布^{[2](171)}。文化地理区一般可分为功能文化区、形式文化区和乡土文化区三类。功能文化区以某文化特征受政治、经济或社会某种功能影响, 其内部彼此之间有一种相互联系从而确定其分布区范围的文化区。比如, 一个国家、一个行政区划、一座城市, 甚至一个教区、学区都可以算作一个功能文化区。它有一个中心点, 如省会、首都、市政厅等, 在功能上起着指导或协调的作用。形式文化区, 指某种文化现象或某些相互联系的文化现象, 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中的核心区和模糊的边缘区。比如, 某种语言、宗教信仰、风俗或其他文化特征, 以及多种相互关联文化特征在地理上的分布区域,

两湖荆楚文化区即属于多种相互关联文化特征的文化区。乡土文化区, 指居住于某一地区的居民的思想感情上有一种共同的区域自我意识。或者说, 它是区域内居民对于该文化区域的一种心理认同, 同时也得到区域外人们的广泛认可。在文化地理学中,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美国东南部得克萨斯州以东、俄亥俄州以南的“迪克西”(Dixie)区, 该地区以“迪克西”(Dixie)为文化标志符号, 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文化区域概念^{[3](13)[4](44)}。湖北、湖南两省自春秋战国以来, 经过相对漫长而持续的文化交流、融合过程, 逐渐形成荆楚文化区。与其他地区相比, 两湖地区具有明显相似的文化属性和心理归宿。尽管这种文化区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域界限, 但事实上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了一种感觉文化区域, 而且根深蒂固, 具有相对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

先秦时代, 今湖北和湖南地区属于《尚书·禹贡》九州分野的荆州之域, 处于蛮夷所居的荒服之列, 西周春秋之际, 活跃于今湖北南漳县境内荆山一带的楚人筚路蓝缕, 开疆拓土, 吞并诸群蛮部落而立国, 其疆域北抵汉水以北, 南至洞庭湖以北, 春秋时期的文献《国语》《左传》记载的楚王狩猎区“云梦”, 包括有山林、川泽、湿地、丘陵和湖沼的多种地貌形态的综合区, 面积几乎囊括整个江汉平原。其中的云梦泽主体在今江陵以东、江汉之间, 部分则在汉江北岸的天门、应城一带, 南抵长江为限^{[5], [6](32-34)}。楚都几经迁移, 最后形成以郢都(今江陵县北纪南城)为中心的

收稿日期: 2008-12-08

作者简介: 江凌(1975-), 男, 河南浙川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后,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历史地理学, 新闻传播学, 编辑出版学。

楚国和具有地域特色的楚文化区。随后，楚之国力发展，对外开疆拓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7]。触角伸向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地区，但当时楚国忙于北上称霸中原，无暇估计长江以南的管理与开发。

春秋中期，楚人在湖南开发的重点在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迄今为止，江南地区发现的春秋中期楚文化遗存集中于此，湘江下游两座青铜楚贵族墓的发现，表明楚人对湖南的开发已由过去自发的民间交流和文化传播方式转变为官方组织的有序开发。澧水流域的春秋中期楚文化遗址有临澧新安墩塔、停弦李家嘴、余市黄家组^[8]，以及津市阳由实屁股、新洲邵家嘴等^[9]。据三处遗址的考古材料材料报告可知，遗址中有红陶粗绳纹鬲口沿、截锥鬲足等。在湘西北发现了春秋中期楚墓一座，出土陶鬲、罐与当阳赵家湖遗址的鬲、罐相近，但略嫌晚^{[10](34-42)}，当与春秋中期湖北境内楚国物质文化一脉相承。湘江下游春秋中期楚文化遗址有两处铜器墓及岳阳铜鼓山周代遗址、岳阳阎家山遗址。岳阳凤形嘴山一号墓和汨罗高泉山一号墓具有明显的楚文化特征，葬制和随葬器物与湖北、河南同时期楚墓基本一致。唯凤形嘴山一号墓墓底铺以鹅卵石，铜盂捉手、铜盘附耳均由数条小蛇缠绕而成，不见于其他地区，体现了江南水乡的地方特色。该墓所出铜盂的铭文为湖南出土的最早楚文字资料，标志着楚对湖南地区的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春秋晚期，楚国积极开发湖南地区，扩充版图，充实国力。此时期湖南省的楚文化遗存遽然增多，除了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外，在资水下游和沅水中游、下游地区都有楚人足迹。出土器物的种类增加，如鬲、盂、豆、罐、盆、甗，建筑用的筒瓦、板瓦，以及漆木器、丝织品、乐器等等，种类和数量较为丰富。另外，楚墓普遍随葬兵器，而且数量和种类可观。这一方面表明当时楚国的青铜冶炼技术飞速发展，铜器产量剧增；另一方面反映当时战事频繁，尚武思想在两湖地区已经深入人心。在湘西北，楚人沿澧水到达今石门古城堤一带，其南则发展到今常德市附近。在湘东北，楚人势力发展到今长沙、湘乡市一带。在沅水中游的溆浦、辰溪等地也发现了零星的楚文化遗址。楚人进入湖南地区前，这里属扬越文化区，楚人南下湖南后，楚、越文化发生了接触、碰撞、交流和融合。比如，春秋中晚期的韶山灌区湘乡一号墓(65SXM1)、湘乡新塘冲2号墓(M2)皆为越族墓，前者随葬品主要为越式铜鼎、扁茎剑、双穿矛、人字形削刀、印纹陶罐等越式器皿。但腰坑出土一件铜浴缶，周身饰蟠螭纹，属典型楚式器。新塘冲2号墓(M2)出土的铜鼎与

湘潭古塘桥、衡南胡家巷出土的越式鼎相似，但浴缶则为典型楚器。楚文化器物出现于越人墓中，表明楚文化对越文化的渗透与交流、共存。同时，春秋晚期湖南地区楚文化遗存中也经常可见越文化因素，湘乡何家湾一号楚墓的三件越式鼎，表明楚人对越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战国时期，楚国完成了对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水流域的征服，并设立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政治体系，以加强统治和管理。湖南境内“至迟于春秋末年楚已于江南设县”，即江南县^{[7](283)}。大量县邑设置于战国中晚期，比如长沙、益阳、罗、耒阳、零阳、酃、越巽、辰阳、沅阳等，县邑之上置君，如上赣君、临武君等；县邑之下置“里”“域”等基层单位，如罗之“观里”“虎域”等。战国早期和中期，楚人加强了对湘北地区的控制，同时在湘中、湘南及湘东赣西地区继续扩张势力，目前在湘北和湘中共发现楚墓4000多座，其中多数为战国早期和中期楚墓。在湘南的资兴、郴州、耒阳、永州、衡阳、靖州、黔阳等地发现战国楚墓400余座，在湘东的株洲、衡山、浏阳、平江等地也发现了一些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遗存。比如，平江的安定古城、江门遗址，时代为战国早、中期，楚式鬲、豆、盆等器物与印纹硬陶共存^[11,12]。在湘西的保靖、芷江亦有楚文化遗存。湖南境内楚墓的出土文物表明：楚人的冶铁业、青铜铸造业、琉璃制造业、漆木器业比较发达，商业也比较繁盛。战国时期楚人在湖南地区开发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活动范围空前扩大，几乎遍及整个湖南全境；二是活动区域从平原、盆地地区延伸至低山、丘陵地区。从春秋时期的洞庭湖平原和湘中盆地扩展到战国时期的湘南、湘西及湘东的丘陵地区。三是多集中在交通便利、战略位置重要或物产丰饶地区，尤其集中在湘、资、沅、澧四水及其支流沿岸阶地和冲积平原或丘陵山区的交通孔道上。比如，鄂君启节是战国中期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商业免税证明，它记载了鄂君启的商队所经过的交通路线，其舟节所载的西南水路为：“上江(长江)，入湘，……庚酃；入资、沅、澧、油。”湘、资、沅、澧即今湖南四水，“油”即古油水，发源于湖南石门县境内，东流经澧县和湖北松滋县，至湖北公安县北古油口入江^[13-16]。从出土器物来看，湖南境内战国楚墓所出遗物如铜、铁、漆器和琉璃、竹筒、帛书等，种类和数量众多，做工精细，工艺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战国时期是楚文化与南方扬越文化、骆越文化、湘西北巴文化、西南夷诸文化融合与统一的重要时期。战国时期，江南地区楚文化遗存中仍有扁长足外撇的铜鼎、扁茎铜剑、多耳矛、人字形削、印纹硬陶等越式

器物,表明楚越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仍在继续;长沙树木岭一号战国墓,出土有玉璧、铜镜等楚器,随葬的人形铜匕首与越南东山文化相近,属骆越作风^[17,18],可见楚文化也与骆越文化共存和融合。以虎纽鍔于、肖形虎印、绳纹凸圆底陶罐、深腹圈足陶簋形器的巴文化遗器在湘西、湘西北多次被发掘,说明楚、巴文化在战国时期也有交流与融合。战国晚期,楚国势衰落,秦将白起拔郢,楚国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中原文化因素对楚文化影响加剧,并日趋主导地位。

二、两湖地区文化的基本特性

秦灭楚后不久,统一了全国。尽管楚国灭亡了,但荆楚文化区的文化感觉或文化概念却留在了两湖地区人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文化心理归属,且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影响渐趋深远。比如,明代竟陵派诗人谭元春经常自我表白:“谭子自念其为楚人。”^{[19](255)}这种文化地域感觉甚至影响了他的行为:“钟子与谭子皆楚人,楚之岳曰衡、蓼。衡较远,至于蓼,与谭子无岁不期,无言不及。”^{[19](255)}引文中的钟子指其同邑诗人钟惺,也是竟陵派的主将。可见,两人因为“楚人”的共同文化感觉,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和日常生活。当然,文化心理感觉区尽管只有模糊的边界,但还是要以客观事实为判读指标的,亦即中国传统观念中体认文化区域的基本要素。周振鹤先生认为,文化区域的判读因素主要有:语言、宗教(民间信仰)、风俗(包括风气时尚、居住方式、岁时节令、衣食特征等)、文化中心等^{[20](5-8)}。本文从其观点,并以方言、民歌、宗教信仰、民俗为例,对两湖地区的文化区域判读指标简要分析如下。

就方言而论,先秦时期,楚地方言属诸夏以外的民族语言,《左传·宣公四年》曰:“楚人谓乳穀;谓虎於菟。”据张永言先生考证,“於菟”是古代藏缅语言的汉字记音^{[21](24)},古代巴蜀地区多楚人,与荆楚关系密切,秦灭巴蜀后,蜀人始出入中原地区,言语方与华夏相通。当然,楚人历经北上争霸中原,部分言语逐渐与华夏混合。比如,屈原所作的《楚辞》从整体上看,其语言已不是一种民族语言,但仍保留着楚地特色,例如《楚辞》中常用的虚词“兮”,用法与中原地区的《诗经》大为不同,《诗经》中的“兮”是感叹词,《楚辞》中的“兮”字不用作感叹词。如《九歌·国殇》:“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楚辞》中有个“些”字,用于句尾表语气,不见于《诗经》,如《招魂》:“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两汉时期,楚

地方言与其他地区的差异仍很明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所提到的方言区域或地点共68个,提到次数最多的“楚”,共23处,可见楚地方言在两汉时期占据的地位相当重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自永嘉之乱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使北方方言混化和南北方言融合,造成了南方方言区划格局的大变化,但当时的北方人对楚语仍很敏感。《世说新语·排调篇》曰:“支道林入东,见王子猷兄弟还,人问:‘见诸王何如?’答曰:‘见一群白顶鸟,但闻唤哑哑声。’”在北方人看来,楚语听起来像白顶鸟哑哑地叫,别人根本听不懂。唐宋时代,楚语还是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并与北方官话交融,形成新湘语;同时,两湖地区内部语言也互相交流和融合,形成新语区,并逐渐奠定了今天荆楚不同语区的基础。唐代张说在江汉平原上赋诗曰:“旃裘吴地尽,髻荐楚言多。”^{[22](956)}唐代孟浩然有诗曰:“听歌知近楚,投宿忽如归。”^{[23](1653)}唐代诗人对楚语的文化心理指归,从唐诗中可见一斑。南宋时代,北方话和楚地的湘语界限在今湖北和湖南省境内。在湖北省境内的一段是以长江为界的,在湖南省境内的一段是以荆湖南路和荆湖北路的行政区界限为界的。西晋末年和唐末安史之乱后,大批北方人民两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了北方官话,今常德地区的官话在唐代中期已经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到达湘资流域下游地带的北方方言跟原有的湘语进行接触和交融,奠定了今天以鄂州岳阳、长沙、益阳地区为主的新湘语的基础。宋代所置荆湖北路,把整个沅澧流域和湖北南部纳入以江陵为中心的同一个政区内,大大有利于本是少数民族五溪蛮居住地的沅江中上游的开发,使官话的影响从沅水下游向中上游推进,逐步扩展到整个沅澧流域。此外,五代以来尤其是明代江西移民填湖南,在湘东自北向南形成一条狭长的赣方言地带^{[24](265-270)}。

就民歌而言,荆楚地区自先秦以来广泛流行生动的民歌,湖北境内以劝勉劳动的歌曲——“相”为主,战国时期,句子常年居楚,所作的《成相》辞56章,句式参次有定格,即是借鉴楚地民歌“相”之作。秦汉时期,“相”类歌谣在荆楚大地继续流行,云梦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有韵文8首,与句子《成相》句式相同,明显是因袭民间曲调“相”,用韵严格,如其中一首为:“审民能,以任吏,非以官禄使助治。不任其人,及官之缙岂可悔?”“能”“吏”“治”“悔”为古之部韵。这种一首五句的歌谣格式,是荆楚民歌的一大特点,影响深远。比如,唐代诗人李白的《荆州乐》即采用五句式。直到近代,不少湖北民歌仍多五句式。唐代湖南湘水流域较为著名的民歌是上游潇水

一带的船歌,多以“欸乃”为发语词,名为“欸乃曲”,其节奏自由舒缓,曲调悠扬。湘中一带的渔歌较为有名,沅水流域既有楚歌,又有蛮语,更有著名的《竹枝》民歌,竹枝词均为七言四句,格调大多比较哀怨。人称“楚人歌《竹枝》,游子泪沾衣。”^{[25](6892)}宋代湘中地区民歌可细分为山歌和渔歌两种,渔夫之歌有“些”声,樵夫之歌则有“欸乃”声。“些”为助词,即《楚辞》之《楚些》;“欸乃”即所以发歌(笔者注:即发语词),即柳司马所谓“欸乃一声山水绿”者也^{[26](2121)}。这成为湘中民歌的特色。而沅澧流域的《竹枝》歌已发生变迁且渐趋式微。明代湘中的欸乃歌仍很有名,同时还出现了采茶曲。王夫之云:“贪听姨姨采茶曲,家鸡又逐野凫飞。”^{[27](179)}清代湖南湘水流域的民歌有采茶歌、山歌两种,隐语双关,宛如汉魏遗言。沅水流域渔歌则相当发达,有诗曰:“酒旗半湿柳花口,渔唱一声牛鼻滩。”^{[28](2502)}

宗教信仰是人们世界观的反映,因而是重要的文化要素之一。两湖地区的宗教以佛教为主。佛教在东汉初年已传入中国,至东汉末年,逐渐在北方流行,并开始向南方传播。三国初年,大月支人支谦与天竺沙门维祇难、竺道安来到武昌,共同翻译佛经,孙权在武昌先后兴建了昌乐寺、慧宝寺等佛寺。西晋时,在襄阳修建了武当山寺。东晋宁康年间(373-375年),僧人道恒在荆州传播佛教学派的一支——“心无义”。十六国时期,著名高僧道安在襄阳先后修建了白马寺、檀溪寺,襄阳遂成为当时的佛教中心之一。道安并派弟子到江陵建造了长沙寺、上明寺、西寺。南朝梁武帝是著名的佞佛帝王,梁代的佛教堪称国教,两湖地区佛教大盛,佛寺林立,原有的长沙寺规模空前,号称“天下称最,东华第一”^[29]。陈朝时,仅荆州地区的上明河东寺就有僧侣3500人,净人数千^{[30](618-631)}。可以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已深深融合进荆楚地区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成为该区域文化兴盛的标志之一,而且影响深远,直至隋唐、明清、近现代时期。湖南佛教始于东晋,当时高僧活动主要分布在长沙麓山和武陵平山(平山在今常德市西)。南朝前期,高僧释法愍“隐迹于长沙麓山,终身不出”^{[31](286)}。还有不少高僧来麓山进行过其他形式的弘法活动,据《高僧传》之《刘宋长沙麓山法愍传》记载,刘宋6人,齐、梁两代各2人。长沙成为当时湖南的佛教中心。到陈代光大年间(567-568年),高僧慧思将40余僧带至南岳,南岳遂成为佛教要地,在南朝后期已成为湖南的复交中心。隋唐时期,佛教宗派大兴,湖南有天台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四宗。《续高僧传》与《宋高僧传》载,湖南高僧见于列传者达27人,附见

者13人,这些高僧主要驻锡衡州、潭州、澧州、朗州、岳州等地。佛教在两湖地区广泛应用于各种信仰习俗中,比如,湖南地区丧礼用浮屠自唐宋以来很普遍,直到现在。

在民俗方面,湖北、湖南同为楚文化浸濡之区。《史记》曰:“(西楚)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于积聚。”^{[32](2411)}《汉书》称:“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33](1666)}《隋书》载:“尚书:荆及衡阳,惟荆州……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34](897)}由此可见,楚人自古性格刚烈,迷信宗教。以尚武习俗为例,楚人尚武,迨至后世。“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讲的是湖北人的性格,“九头鸟”出自《山海经》“九头凤”,凤有九头,聪明、精灵,受楚人崇拜,更有狂躁、好动、尚武的特点。湖南人性格则勇猛刚烈,更习尚武。“文多吴音,武多楚腔”“绍兴师爷湖南将”。楚人尚武精神逮至近现代愈益明显。从曾国藩操练湘军实施洋务开始,湘籍军人开始掌握清政府主要兵力。19世纪70年代关内八大总督中,湘人占5位。在文化观念方面,两湖地区学子“喜言兵事”“宁为百户长,胜做一书生”,与多数地区“好男不当兵”相反,两湖地区的习俗是“好男何不去当兵,好女不捏绣花针”。黄埔军校地近两湖地区,长沙和武汉设有黄埔军校,为两湖地区青年投笔从戎创造了便利条件。蒋介石组建48个军,有16位军长是湖南人。20世纪30年代,湖南和湖北两省人口占全国9.8%,而所出将领占全国22.4%。20世纪60年代的全国将领中,两湖地区占全国47.8%。受荆楚文化的影响,两湖地区居民在服饰、岁时节令、婚丧、民居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之处^[19,35-38]。

参考文献:

- [1] 周振鹤.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序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 [2] 翟有龙, 李传永. 人文地理学新论[M].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4.
- [3] TERRY G. JORDAN, LESTER ROWNTREE. *Human Mosaic*[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 [4] 王恩涌. 文化地理学[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5] 石泉, 蔡述明. 古云梦泽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6] 邹逸麟. 中国历史地理概述[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 [7] 徐少华. 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4.
- [8] 湖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湖南临澧

- 古遗址调查报告[J]. 考古, 1988, (3): 213-217.
- [9] 津市文物管理所. 湖南津市古遗址调查报告[J]. 江汉考古, 1993, (1): 31-33.
- [10]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 当阳赵家湖楚墓[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2.
- [11] 李科威. 平江县安定区古城址调查[C]//湖南考古辑刊·第四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12] 岳阳市文物管理处. 平江红门遗址发掘简报[C]//湖南考古辑刊·第六集. 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 [13] 熊传新, 何光岳. 《鄂君启节》舟节中江湖地名新考[J]. 湖南师院学报(哲社版), 1982(3): 85-88.
- [14] 张中一. 《鄂君启金节》路线新探[J]. 求索, 1989, (3): 126-128.
- [15] 陈伟. 《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J]. 江汉考古, 1986, (2): 88-90.
- [16] 陈伟. 《鄂君启节》与楚国的免税问题[J]. 江汉考古, 1989, (3): 52-58.
- [17] 湖南省博物馆. 长沙树木岭战国墓阿弥岭西汉墓[J]. 考古, 1984, (9): 790-797.
- [18] 童恩正. 从出土文物看楚文化与南方诸民族的关系·湖南考古辑刊·第三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
- [19] 张伟然. 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 [20] 周振鹤. 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 [21] 张永言. 语源札记三则[J]. 民族语文, 1983, (6): 24.
- [22] 张说. 荆州亭入朝[C]//全唐诗·卷八十七.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3] 孟浩然. 夕次蔡阳馆[C]//全唐诗·卷一百六十.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4] 周振鹤, 游汝杰. 湖南省方言区画及其历史背景[J]. 方言, 1985, (4): 265-270.
- [25] 于武陵. 客中[C]//全唐诗·卷五九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6] 永州引柳拱辰《风土记》[C]//舆地纪胜·卷 56.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5.
- [27] 王夫之. 明妃曲·十一[C]//王船山诗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28] 田雯. 武陵县[C]//古欢堂集(12).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29] 释法京传[C]//续高僧传·卷 16. 北京: 北洋印刷局, 1923.
- [30] 唐道宣. 感应记[C]//《唐》释道世编纂: 法苑珠林·卷 52. 见王云五主编: 四库丛刊正编·子部(25), 中国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1979.
- [31] 宋长沙麓山释法感传[C]//《梁》释慧皎撰, 汤用彤校注. 高僧传.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2] 司马迁. 史记·卷 129.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C]//《汉》司马迁著, 阙勋吾, 阙宁南注. 史记新注(下册).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 [33] 地理志·第八·下[C]//汉书·卷 28·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4] 志第二十六·地理下[C]//隋书·卷 31.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 [35] 刘玉堂, 张硕. 长江流域服饰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5.
- [36] 夏日新. 长江流域的岁时节令[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 [37] 萧放. 荆楚岁时记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38] 张伟然. 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An analysis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cultures of Hubei and Hunan area

JIANG L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770-476 B.C.), Jingchu culture region has begun to take shape in the Hubei and Hunan area after comparatively long and constant culture exchanges. Compared to other regions, Hubei and Hunan area enjoyed obvious similar culture attributes and mentality. Such a kind of culture region doesn't have definite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but there is in-depth, constant, independent, stable and constant feeling culture area in people's minds. Chu people advocated force, had blind faith in religion, mainly Buddhism, while folk songs, were popular in Jingshu areas with “phase”, Fishermen's Song of the more well-known for the cultural sense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lture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hubei and hunan area; jingchu culture region; commonness in cultures

[编辑: 颜关明]